

在四川省档案馆编辑的一份史料中,记录了李庄乡绅集体为同济大学出头、要求政府当局让出房产的事:“当此非常时期,官民同有协助政府,完成抗战之义务。绅等之所以积极协助同大者,良以该校学子,对于抗战贡献甚大。”有了乡绅及民众的付出,名不见经传的古镇李庄,迅速与重庆、成都、昆明齐名,成为抗战时期中国的四大文化中心之一,也让饱经摧残的华夏文化得以延续生机。据说在当时,一封邮件只要写上“中国李庄”四个字,邮递员就会准确无误地送达目的地。四川李庄,因此被誉为“中国文化的折射点、民族精神的涵养地”。

长江边城的人文记忆(二)

□杜阳林

庇佑学人不废研求

一代才女林徽因于1940年冬天,带着年迈的母亲和一对儿女,辗转来到李庄。林徽因一家的逃亡故事,只是当时庞大难民群中的一个缩影,死亡如同乌云笼罩头顶,炸弹追逐着人们仓皇的脚步,枪炮炸碎了人们原本拥有的幸福。

李庄人对幸福的理解,刻在小镇望族张家祠墙角的石雕上,一壶酒、一块肉,包裹着“福”字。可惜林徽因是在最艰难的抗战岁月来到这里,与李庄百姓以及当时中国千千万万的百姓一样,已无缘去“享福”。战火纷飞,物价上涨,区区薄薪,完全应付不了生活所需。困窘之极时,梁思成只好去宜宾,当掉自己心爱的派克钢笔与手表,换来两条草鱼。他不减幽默,与林徽因开玩笑说:“这块手表红烧了吧,这支钢笔清炖了吧!”

在千疮百孔的生活当中,怎样让肉身活下去,也变成了一场战役,而且这战役耗时颇长,不仅仅需要一时的蛮勇,还需要持久的耐性。

抗战的岁月,生活拮据,学者们捉襟见肘,纷纷向当地百姓学习养鸡种菜。中国营造学社旧址内,至今仍保留着一片菜地,年年岁岁,种子破土,依旧盎然着绿意与生机。望着这些蔬菜,犹如隔着悠长的时间隧道,屏神静气地去凝视,菜地那一端仿佛还站着手持葫芦瓢浇水的长衫学者。

历史与现实交织,事业与生活缠绕,原来无论多么艰苦的岁月,精神都能支撑人的信念不倒,而温饱的追求,又牢牢维系了精神的大厦之基。大时代风刀霜剑的逼迫和摧折,成为炼就人们坚强意志的磨刀石。

在李庄安顿下来,每当夜幕降临,梁氏夫妇就借着菜油灯的微弱灯光,弓着背脊,认真地写《中国建筑史》。

迁徙李庄的学者们,都在见缝插针地著书立说。当生命遭到威胁,活着的每一刻都与危机共存,反而让人静下心来,拼命抓住手里能把握的光阴,和时间争抢,与日子赛跑。谁也不知道明天会怎样,那就过好今天的分分秒秒,即便卧病在床,也争分夺秒,不愿为“活着”留下遗憾。

林徽因的肺病反复发作,严重到了无法下地的境况。她只能每天靠在被子上,在病榻前堆积起了厚厚的《二十四史》和数以千计的照片,实测草图,以及大量的文字记录。

如果林徽因不遭遇这场战争,她留给人们的印

象,也许是徐志摩念念至死的“白月光”,或“太太客厅”中雍容华贵的女主人,但战争彻底颠覆了她的生活轨迹,也重塑了她的人生。她与当年众多知识分子一样,在残酷的战火中,目光渐渐如水也如刀,变得更加勇敢坚定。

远在美国的费正清和费慰梅是林徽因的好友,苦劝她去美国治疗和工作。林徽因慨然道:“我们的祖国正在灾难中,我们不能离开她,假如我们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,我们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。”

“与祖国共存亡”,已经变成一种不可动摇的精神力量,这些知识分子,将自己视为李庄的一株青竹,根须深深地埋进泥土,不愿移挪。

李约瑟博士在1940年夏天来到李庄,见到了他的老朋友、留欧归来的童第周博士。李约瑟完全无法理解,童第周只能借助一台在旧货市场淘来的陈旧显微镜做实验,却发表了数篇引起世界生物学家高度重视的学术论文。李约瑟说,“布鲁塞尔有那样好的实验室,你为什么一定要留在偏僻的山村任教?”童第周的回答很简单:“我是中国人嘛。”

林徽因也好,童第周也好,当时留在李庄赫赫有名的学者,他们身怀绝学,并不是没有机会离开炮火连天的祖国,但都毫不犹豫地选择留下来,留在千疮百孔的中华大地,留在忍饥挨饿的日子里,以一个知识分子的隐忍和坚持,守护与陪伴苦难深重的祖国,以自己艰难的治学和科研,献上最炙热的赤子之心。

1945年,古史学家董作宾耗费多年心血的《殷虚书契》在李庄出版,这是一部在甲骨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。

就着菜油灯,用砖头支腿的木桌,学者们依然做出了惊艳世界的研究。如今叩访李庄,壁上挂着这样一副对联:“国难不废研求,六载清苦成巨制;室陋也蕴才情,百年佳话系大师。”

这是被炮火激发出来的勇气,但并非是转折或突变,这种勇敢和顽强的信念,其实一直都刻印在学者的魂里命里,骨里血里。“轻生生死,重信诺”,中国文化人有着竹子一般的高洁和正直,几千年的铮铮傲骨,几千年的不畏强暴,是最好的文化遗传。“咬定青山不放松,立根原在破岩中。千磨万击还坚劲,任尔东西南北风。”郑板桥诗中的竹,是李庄这群精英学者的真实写照。

默默守护国之精英

竹子高洁修长而秀于林,可竹从无“排外之心”,与其他树木杂伴而生,同展生机,共沐日月,分享雨露。

在和平年代,科学与文化大家们可以从容沉浸在相关的专业领域中,似乎与基层群众隔开了一段距离。当战火弥漫,高等学府真正“走入民间”,他们和不通文墨的百姓之间,朝夕相处,声息相闻,找到了新的共处模式。这是一种“和而不同”的宽仁大度,在保持个性的同时,充分尊重他者。

史语所迁来李庄时,带来的上千箱物资中,包括殷墟出土的甲骨、青铜和陶器。由于上山路陡,挑夫不小心摔了一跤,人头骨从箱子里滚了出来。挑夫见到“死人头”,怀疑史语所是“开黑店的”,内心惊惶不知所措。同济大学医学院的学生,围在花坛处做人体解剖实验,恰被修缮房顶的泥瓦匠看到,吓得魂不附体。

当地居民与外来学者之间有着迥然相异的思维方式,生命个体的平等对话显出了阻滞和隔膜。

倘若任由这种情形发展,百姓会一直生活在惶恐惧怕之中。专家学者们仔细商议,决定搞一次科普展。挂图一目了然,专家现场作深入浅出的耐心讲解,为老百姓普及相关知识,拓展了他们的眼界,消除了他们的误解。

“客人”与李庄人的关系,从来不是油和水,而是一滴水,找到了另一滴水。在贫寒的战时岁月中,人们共同分担着悲苦和欢乐,也从对方身上,寻找和借鉴闪光之处。

学者们心甘情愿留在李庄,教书育人,致力学问。接纳了他们的李庄,面对这群文化人时,开始有几分隔阂,只敢屏气凝神地抬头仰望。随着双方感情渐深,学者的博学多才、专注执着的治学精神也渐渐影响了李庄,李庄人也愿意去靠近,去学习,去了解,去懂得。

细流汇集长江,不舍昼夜,奔涌向前,李庄人有着与长江相依相伴千年,早已有了长江宽宏的胸襟。李庄的美好,在于它的仁厚,在“文化精英”与“下里巴人”相处的六年时间,不同的思潮一次次碰撞,即使挑战了李庄人的固有认知,但他们在认

真思考与分析后,从不固守陈规。

川南一带曾流行一种让人痛恨又无可奈何的瘡病,同济公共卫生研究所教授通过动物实验和反复研究查出了致病原因——原来是四川五通桥的食盐中含有带毒的氯化钡,才导致了川南人谈之色变的“麻脚瘟”。从此成千上万的病人因此得救,同济医学院师生为李庄人民带来了更加科学、卫生的生活方式。

同济大学带来的现代文明,促使这个古老小镇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李庄古镇亮起了第一盏电灯,比县城还要早十多年。这是文明的礼遇,促进了李庄的现代化进程。

在抗战进入最艰苦的阶段,国民政府提出“一寸山河一寸血,十万青年十万军”的口号,号召大中专知识青年投笔从戎,参军报国。当时同济大学全校总人数2423人,有师生700人报名,学生实际从军364人,报名和参军总数列全国高校第一。

国家危急,时局动荡,个人命运也处于风雨飘摇中。知识分子落地李庄,在边陲小镇刻苦学业,以对知识和科学的信仰来保家卫国;学生装换戎装,走上战场,用毕生所学抵挡强敌,是发自内心的忠贞选择。

李庄默默守护着学术精英,为他们提供了一片没有战火硝烟的自由天地;李庄也默默凝望走向军队的年轻人,他们稚气未脱的脸上,写满了绵长浩大的勇气。

学术精英与川南乡民和平共处、共克时艰,谱就了一段传世佳话。这是属于长江的洒脱,这是属于修竹的品格,这是属于中华民族的大爱情怀。

如今的李庄,还保留着旧时的几分模样,炊烟在屋顶缭绕,紫与红的牵牛花探出了竹篱笆。一些老人坐在院墙前,注视脚下的江水,几片薄云歌在他们的头顶,日子仿佛是一幅剪影,能从过去直接粘贴到现在。但生于平稳繁荣的盛世,所有的恬淡都有了归处,所有的从容都注定会被珍惜,今天的好日子,令人心悅。

宜宾另有一段文化抗战史,发生在距离李庄几十公里,人称“万里长江第一县”的江安。

此心安处是江安

浪花翻滚奔涌,逶迤向前,长江自西向东穿过江安这座小城。

江水不竭,在长江与涪江汇流处的古崖上,有一座始建于东晋穆帝永和二年的古镇,它就是江安古镇,现为宜宾江安县城。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,长江水路连接了四川“天府之国”与江南“人间天堂”的便捷通道。江安位于黄金通道的一个节点,向世人展示着鲜明的江城底色。

江安盛产楠竹,登高远眺,遍山苍翠,竹影萧萧,清幽雅致。上世纪80年代,著名戏剧家吴祖光回到魂牵梦萦的“人生第二故乡”江安,难抑激动挥毫写下诗句:“长江一线意情牵,北望青青四面山,四十四年寻旧迹,几生修得住江安。”

四十四年前的一段缘分,竟让吴祖光念念不忘。当我们掀开“历史旧迹”时,也将时光推回到了炮火硝烟的抗战时期。

1939年4月,成立不到四年的戏剧专科学校,为躲避战乱,自南京溯江而上,辗转长沙、重庆,最终随着长江之水,迁入江安。江安,为这群颠沛流离的剧专师生提供了长达六年的安稳办学期。

江安产竹,也善于“用竹”,江安竹簧兴盛于明正德年间,曾于1915年漂洋过海,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金奖。江安这座小城,看似偏远,实则拥有便利的水运交通,信息并不闭塞,荣誉曾通达西方,江安特产惊艳过世界。

生长在楠竹的海洋之中,自幼与竹相亲,江安人身上秉承了竹之特性:清华其外、澹泊其中。这种个性,又与剧校的授课风格有着奇妙的相似相近之处。

剧校校长余上沅遵循“思想自由,兼容并包”的学术原则执掌校园,知识与专业能力在这里得到了最大尊重。当时要教授一门刚刚引入中国不久的西方艺术,课程既没有以往经验作参考,也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和课本,剧校的教学,更多依赖于教师们的个人理解和创造。

余上沅给予年轻教师的“自由”何其珍贵。这一群人,如同暗夜行路,难以辨认脚下是坦途还是坎坷,又似踩水过河,未知河水深浅,不明脚下是滑石还是泥污。余上沅却有勇气让大家放胆尝试,他温文尔雅的外表下,其实藏着一颗勇于探索之心。

当我们迈入昔日剧专旧址,站在泛黄的手稿褪色的照片之前,想着余上沅的大胆创新,作为一个隔着时代洪流、同样从事教育事业的人,也不由得赞叹他的非凡勇气。照本宣科、规行矩步,自然比变革与鼎新轻松许多,但余上沅为何会在一座长江边城,拥有对麾下教师“无为而治”的信心,任由他们去改革去创造呢?

江安的安静之中,藏着激流,余上沅的自由之下,藏着严谨。一个人、一所学校、一座城的相遇,看似轻巧的偶然,不经意的安排,内里却布满了命运草灰蛇线的点滴际遇。

这是一场时间与空间的伟大“相遇”,如同彗星与木星交汇的刹那,出现灿烂景象,在其后岁月,依然不断延续着独特的光芒。距离抗战已过去数十年,走上这片土地,至今能见到当初痕迹。那些保存完好的房屋、桌椅、学生作业、大师批阅……勤勉的先辈,躬身于一盏灯火摇曳的油灯前,书写着他们对于祖国的热爱与依恋。斗转星移,当我们来到同一个地方,共享同一个空间,隔着时间的距离,依然能感受这份激荡的情愫。

中国艺术精英与江安的遇见,是抗战那段血色斑驳的日子中,一抹温暖的亮色。